

史家 之 哲思

张荫麟哲学文存

陈润成
李欣荣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史家之哲思

张荫麟哲学文存

陈润成
李欣荣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家之哲思: 张荫麟哲学文存/陈润成, 李欣荣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301-29344-7

I. ①史… II. ①陈…②李…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6988 号

- | | |
|-------|--|
| 书 名 | 史家之哲思: 张荫麟哲学文存
SHIJIA ZHI ZHESI: ZHANG YINLIN ZHEXUE WENCUN |
| 著作责任者 | 陈润成 李欣荣 编 |
| 责任编辑 | 吴 敏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344-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420 千字 |
|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7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编者序言

——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

张荫麟，号素痴，广东东莞人，早年肄业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四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获文科学士及硕士，后转入经济系，研究社会经济学，于1933年底回国。次年任教清华大学，授课哲学历史两系，同时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1935年应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抗战爆发后，只身南下，后任教天目山浙江大学及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转教遵义浙江大学，1942年以慢性肾脏炎病逝，时年三十七。生平文史著作约百万言，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作品以《中国史纲》为最著名。

张荫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钱穆称他“博通中西文哲诸科”^①，熊十力赞他为学宏博，“史学家也，哲学家也”^②。他以哲治史，这点他在致张其昀的信中说得很清楚。^③若要了解他的史学，首先要研究他的哲学。但时下几种张荫麟文集所收的哲学论文，寥寥可数。^④对于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尤其是在斯坦福大学时期的学术生活，几近空白。主要的原因还是可供参考的基本资料不多，数十年来，只有谢幼伟专文介绍张荫麟的哲学，但他们相交于张氏在遵义浙大的岁月，他对张氏早年研究哲学的历程不大清楚。^⑤从贺麟的悼文，我们知道他们在留

①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又见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35页。

② 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21—22页。

③ “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张荫麟：《致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自斯坦福大学。见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3—674页。

④ 近人所编选集共四种，包括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共收九篇哲学论文及译文；李毓澍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共收十一篇；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共收十七篇；李洪岩编：《素痴集》，天津：百花出版社，2005年，共收十五篇。

⑤ 谢幼伟：《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151页。

美时期,常以中文和英文通信,后来贺麟从哈佛转往柏林大学,他们有时还用德文通信,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数据早已失落。^① 谢幼伟和贺麟分别提及张氏在斯坦福大学研究摩尔(G. E. Moore)伦理学的硕士论文,可惜二人都没有机会读到该论文^②,一般学者都以为张荫麟的论文已随着他的藏书在战乱中散失。笔者有幸,在斯坦福大学访得他的硕士论文和成绩档案,同时李欣荣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容庚档案中发现十五封张氏在留美期间写给容氏的信。我们合编《张荫麟全集》时,在中外各大图书馆总共收集了三十八篇张氏的哲学论文。这些资料正好给贺麟和谢幼伟的文章作补充,让我们进一步全面探讨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认识前辈的哲学修养和成就,更有助我们研究他的史学。

一 清华受业——哲学奠基期

张荫麟研究哲学的历程,就其思想倾向及作品的特色,可分三期。第一期从1922年到1929年,是他的哲学奠基期。他在清华学校受师友的熏陶,跨越国学,研习新学科,接受西方的哲学思想。七年后,他决定到美国攻读西方哲学。这段时间他在哲学方面翻译了一些关于西方思想和汉学家的论文。

1922年张荫麟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转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③,他自幼受父亲的指导,国学基础扎实,抵校不久,便以《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① 贺麟:《我所认识的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1页。

② 贺麟:《我所认识的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3页。谢幼伟:《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166页。

③ 贺麟在《我所认识的荫麟》说张于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此后史学界人士随其说。最近笔者在斯坦福大学的档案里,发现张荫麟的斯坦福大学入学申请书,清楚说明他在1922年入清华中等科(英译Tsinghua Middle School)二年级,三年后升高等科(Tsinghua College),于1929年毕业。申请书附有清华大学盖章的成绩单,把他七年来所修的科目及成绩,一一列出。这些文件证明他是在1922年进入清华攻读二年级。1923年贺麟认识张荫麟时,张正在读中等科三年级。贺麟误记,以为张是刚来的新同学。在同一文里,他说梁任公在1929年逝世,张荫麟由美国写了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实则梁任公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张荫麟所写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先生》同月在第六十七期的《学衡》发表,又见同年2月11日的《大公报》。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8页),当时张仍在清华。根据斯坦福档案,张荫麟于1929年10月入学。查梁任公去世时,贺麟正在哈佛研究院深造,此又一误记。又张荫麟于1929年7月刊登在《学衡》的《纳兰成德传》,文中有“余读书于清华园且七载”一句,见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从1922年到1929年,恰好七载,他的清华园生活,始于1922年,又一旁证。

一文赢得梁启超的赞赏,但他并不满足于考据,努力不懈,向新的学术领域迈进。

在清华的师友中,贺麟、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和金岳霖对张荫麟的影响深远。他很早便结识比他高三级的贺麟,二人志趣相投,一起选修梁任公和吴雨僧的课。贺麟于1926年毕业,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攻读西方哲学,这时刚巧张荫麟的父亲逝世,他南下奔丧,二人一起从天津搭船到上海,张荫麟在黄浦码头送别学长,然后转往广东。^①中美两地远隔重洋,二人书信往来,继续学术讨论,三年后张荫麟赴美攻读哲学,显然受到学长贺麟的鼓励。

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和金岳霖这四位清华大师从不同途径把张荫麟引进西方的思想世界。从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老师的演讲和著作,他开始认识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和叔本华(Schopenhauer)各大师的学说^②,渐渐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也肯定了用西方观点研究中国文史的方法。张荫麟随吴宓习艺四年,他的英语阅读、写作和翻译的功力,已达专业水平。对西方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人文主义,更了如指掌。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翻译英诗,兴趣渐渐转到教育理论和西方哲学,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代表作是《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原书名 *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 Summary and Criticism of Splengler's "Decline of the West"*,由美国史家 E. H. 葛达德(E. H. Goddard)和 P. A. 吉朋斯(P. A. Gibbons)合著。这是刘奇峰于1927年从纽约寄给吴宓的新书,吴宓转交弟子张荫麟翻译,翌年在《学衡》和《国闻周报》连载。^③他再接再厉,在赴美前夕,翻译了几篇短论:《德效谥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无系统哲学之故》,吴宓的老师白璧德所著的《论班达与法国思想》,另一篇是罗素(Russell)的《评现代人的心理》,还评介法国汉学家戴密微(Demieville)的英译《商君书》。

在西方哲学方面,金岳霖对张荫麟的影响最大,是他的启蒙老师。金岳霖于1914年毕业清华学校,后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成立不久,赵元任推荐他进清华创办哲学系,并出任系主任。金岳霖的哲学观点倾向新实在主义(Neo-Realism),醉心罗素及摩尔的学说,认为逻辑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④张荫麟在留美前一年修了他讲授的逻辑学和哲学问题两门课

① 贺麟:《我所认识的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0页。

② 黄见德:《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37,44—51页。

③ 王敦书:《吴宓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贻书堂史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83—685页。

④ 有关金岳霖和清华哲学系的资料,见张岱年写的《回忆清华哲学系》,收入廖名春、刘巍编:《老清华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2—318页。

程,成绩优异^①,决定到美国攻读西方哲学。

二 留美四年——倾心新实在主义

张荫麟为什么选择哲学呢?毕竟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应用型的学科。吴宓曾希望他的优秀学生跟他习文学,很快他失望了,发觉他们“欲习所谓既实际有用之科学,以从事爱国运动,服务社会”。^②但也有例外。贺麟于1926年赴美,他的意志坚定,不顾家人的反对,以哲学为终身事业,他说“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把握最后真理,体验时代精神的精华”^③。与贺麟不同,张荫麟一向喜欢历史,为什么改行读西方哲学?他在斯坦福大学给容庚的信写得很清楚,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暂转向哲学”。^④个中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他拿的是留美奖学金,但不会到美国读汉学,据谢文通说,他最看不起那些“不懂装懂的美国汉学家”^⑤,也不准备读西洋史,因为他在清华只读了一门西洋通史^⑥,如果专攻西洋史,肯定要补很多课。这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他在清华已修了逻辑学、西方哲学史和哲学问题等数科,读了一些欧洲哲学参考书,翻译了一本有关斯宾格勒学说的书,加上贺麟和金岳霖的鼓励,他选择西方哲学是顺理成章的。

张荫麟于1929年秋季从上海出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船上中国留学生三百多人,只有他和谢幼伟准备到美国读西方哲学,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⑦,船抵西雅图后,谢幼伟乘火车东往哈佛大学,张荫麟南下旧金山,再转往斯坦福大学。他选择该校,因西部生活成本较低,可省点钱,以供弟弟炜麟在南开中学读书。^⑧

① 见斯坦福大学档案,张荫麟在清华学校的成绩档案。

② 吴宓:《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三册,第290页,1925年,8月6日,星期四。

③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85页。

④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29年11月4日。见《全集》,上卷,第656页。又见1930年1月2日,“吾人治学当从性之所好,不能计较社会之需求也”。见《全集》,上卷,第659页。

⑤ 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广州文史资料》,第38期,第57页。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89页。

⑥ 见斯坦福大学档案,张荫麟在清华学校的成绩档案。

⑦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见《天才的史学家》,第67页。

⑧ 贺麟:《我所认识的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2页。又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第46页,1931年1月10日,“美国张荫麟有信来,并汇上美金三十元,嘱转其弟,作学费。即函天津南开中学张炜麟”。

从1929至1933年,张荫麟留美四年,进入他的哲学研究历程的第二阶段,他在斯坦福三年修了十四科西方哲学^①,熟悉西方哲学的源流、演变及发展,以及康德等名家学说。完成硕士论文,发表了多篇哲学文章。但在第四年,他改行研究社会经济,计划回归国史,实行以哲学和社会学治史。在斯坦福大学他受业于杜威的门人,四年后,他的思想仍倾向新实在主义,崇拜剑桥大学的摩尔大师,老师金岳霖对他的影响丝毫未减。

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85年,学校规模不大,修读哲学科目的学生更少,直至1906年,哲学课程多由访问学者讲授,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史阿特(Henry W. Stuart)应聘出任教授,后来又邀得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布朗博士(Harold C. Brown)加盟斯坦福哲学系。二人师出名门,史阿特是杜威的早期弟子,1900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长于伦理学和逻辑学,他在美国西岸的学术界也薄有名声,于1925至1926年荣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主席。布朗毕业哈佛大学,是黑格尔(Hegel)专家鲁一士(Josiah Joyce)的高足,专攻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他在斯坦福讲授哲学史、美学等科目。在哲学界相当活跃,先后于1924—1925年和1932—1933年在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当过两届主席。^②

史阿特和布朗分别在斯坦福任教了29年^③,在他们的领导下,哲学课程从副修(minor)扩展为主修(major),接着发展高级课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又成立博士班,至此斯坦福的哲学系渐具规模。^④

张荫麟就在这时进入斯坦福大学进修哲学,系主任史阿教授自然乐意当他的导师。其时清华已升格为大学,斯坦福校务处对清华的学制也很清楚,他在清华最后两年所修的科目,包括英文、德文、翻译、社会学、逻辑学、哲学问题和西

① 张在斯坦福修了十一科哲学:伦理学,希腊哲学,中古哲学,现代哲学,美学,近代思想,康德,亚里士多德,智慧的历史(History of Intelligence),知识论(Epistemology),自然的演绎(Interpretation of Nature)。旁听两科:近代理论和美国的哲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了代数逻辑一科,总共十四科。

② 斯坦福大学哲学系Tanner图书馆主任Evelyn McMillan提供数据。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大学哲学系的情形,可参考萧公权:《问学谏往录》,1997年,第51页。“(密苏里大学的)哲学系只有两位教授。主修哲学的学生……一共不过四五名。这是一个冷系。两位教授尚没有赫赫之名。”又参考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1月2日。“哲学滞销岂惟中国,此间亦复尔尔。”见《全集》,上卷,第659页。

③ 史阿特在1907年上任,1936年退休。布朗在1914年应聘,1943年退休。二人分别在斯坦福教了二十九年。

④ 在1921年,斯坦福的哲学课程从副修扩展为主修,并发展高级课程,两年后,该系成立研究院,同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3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Evelyn McMillan提供数据。

方哲学史,斯坦福全部接受,他直升大三,选读核心课程(core courses)。系主任史阿特深受其师杜威的影响,实用主义(Pragmatism)已成斯坦福哲学系的主导思潮。学习的重心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注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道德、伦理、人生观等哲学问题。他第一学季读三门课:伦理学、希腊哲学和现代心理学。^①开始时特别紧张,恐怕成绩不好,见笑外人,等到中期考试(mid-term examination)的结果揭晓后,成绩不错,如释重负,他在信中跟容庚说:“从此可以如在清华一般逍遥自在矣。”^②

他在美国读西方哲学,并未忘掉国史,打算学成回国后,再继续研究。偶读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本(Gibbon)自传,从中得到一个启示,吉本于三十岁开始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五十一岁完成巨著。他这样想,学成归国之日,自己仍未到三十,幸运的话,也可以实现如吉本的伟绩。^③当时就是料不到,天不假年,致壮志未酬。

过了第一学季,张荫麟计划此后每学季选四门或五门课,赶快毕业。^④他在冬季学期(Winter Quarter)读欧洲史、社会学、现代哲理和中古哲学。他告诉容庚,对欧洲史颇感兴趣,但不准备改行,因为他很喜欢哲学,而且觉得读哲学比较容易。^⑤但也有些哲学科目他不喜欢的,例如他当时正修读的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改革史,在致容庚的信中,大吐苦水:“……(为本校哲学系必修),素不喜此,格格不入,又不能不应付,每一展卷如饮黄连。”^⑥

春季学期他读美学、现代哲学、近代思潮,旁听一科心理学,他对这几门课都“很感兴趣”。^⑦暑期留校修欧洲史和经济原理,并旁听现代哲学理论及美国的哲学发展。秋季学期他选了五门课:康德哲学、欧洲史、科学概论、政治学概论和变态心理学^⑧,功课繁忙,他要尽快完成全部核心课程,申请毕业,终于如愿以偿,斯坦福于翌年1月授予文科学士学位。

张荫麟在清华以文才见称,屡有佳作。但他在斯坦福功课实在太忙,未能抽空写作,致“美国访书记”和“清史外征”两个研究计划都未能实现。^⑨在哲学方

① 见斯坦福大学张荫麟成绩档案。

②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29年11月4日。见《全集》,上卷,第655页。

③ 同上书,第656页。

④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1月9日。见《全集》,上卷,第660页。

⑤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1月2日。见《全集》,上卷,第659页。

⑥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2月28日。见《全集》,上卷,第662页。

⑦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4月6日。见《全集》,上卷,第663页。

⑧ 见斯坦福大学张荫麟成绩档案。

⑨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30年2月28日。见《全集》,上卷,第662页。

面,他发表了三篇哲学评论。第一篇《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响应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比较》,这可说是理与气的讨论,贺麟以为朱子对太极性质的看法,是介乎心与理之间,张荫麟肯定朱熹的太极是实质的,他受西方哲理新实在主义的影响,倾向反唯心论,与贺麟的心理合一说,如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二人哲学思想的分歧,引致贺麟的感慨:在哲学方面,他们志同道不合。^①

第二篇是《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他在哲学系读了布朗教授主讲的美学,后来又修了一门康德的哲学,学以致用,他试用康德的批评方法,分析中国书艺中的美学原则。第三篇《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冯友兰的书是划时代的著作,张荫麟当然不会错过,他从体裁、方法和考据方面评冯友兰的哲学史,参加这场哲学史编写的讨论。

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的读书环境本来很好,他经济充裕,不用兼职,校园清静幽雅,景色宜人,抵校不久,他在信中告诉容庚:“……在此百无萦虑,日惟展卷与古今贤哲对晤,盖十数年来无此清福也。”^②他用功读书,在一年半内便取得学士学位。但他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留美前,他和女朋友伦慧珠闹翻,却忘不了旧情,留学期间,一直被情感问题困扰。^③在社交方面,他不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所以特别觉得孤寂。读书方面,哲学系是冷系,很少同学,更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④据沈有乾和萧公权的经验,一般美国教授特别鼓励成绩好的外国学生。^⑤但张荫麟对实用主义没有兴趣,总觉得教授不如理想。这时贺麟已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哈佛攻读硕士学位,他劝张荫麟转往哈佛,张以经济条件不允许为理由,无意东迁。^⑥

他主意已定,继续留校读硕士,在两个学期内,完成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康

① 张荫麟:《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1930年12月22日。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页。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4页。

② 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29年9月20日。见《全集》,上卷,第654页。

③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1页。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29年9月20日,1930年1月2日,1月26日,2月28日,8月9日诸函。见《全集》,上卷,第657—665页。

④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2页。张荫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学,1929年11月4日。见《全集》,上卷,第656页。

⑤ 沈有乾,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于1926年获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有关美国教育人士对中国学生的态度,见沈有乾:《西游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39页。萧公权,江西泰和县人,肄业清华学校,留美深造,于1923年获密苏里大学哲学硕士,三年后考取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7—75页。

⑥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2页。

德的哲学、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知识学(Epistemology)、社会改革五门高级课程,至此剩下论文占15学分。^①史阿特当然鼓励他的学生研究杜威老师的哲学思想。但张荫麟心仪的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摩尔教授,20世纪新实在主义哲学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形下,张荫麟选择写一篇论文比较摩尔和杜威二人的伦理思想,英文题目为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 E. Moore and John Dewey。^②

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是一种实践的道德哲学,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环境的产品,思索与新观念可改变社会环境,在当前社会变迁的时代,个人必须针对社会改革而考虑自己的行动。杜威深信道德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道德规律,只有工具的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他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倡道德教育,培养智慧,使我们能发现善之所在,乐于实行。^③

摩尔的反唯心论思想贯彻他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他首创“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一词,提出了“善”这一基本伦理学概念不可分、不可界定的观点,如果用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标准来解释“善”或其他伦理概念,那就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他在批判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推理法则,也开了后来伦理学家从语意的观点讨论道德语言的风气。^④

摩尔和杜威都是一代宗师、哲学界泰斗,要写一本详尽的书来比较他们的伦理观,当属长篇巨著。张荫麟写的却是硕士论文,是大题小做,把重心放在理论上,力求精简,免去历史枝节,不谈二人的教育背景和思想的形成,一开始便讨论

① 见斯坦福大学张荫麟成绩档案。

② 硕士论文题目的选择,可参考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52—53页。

③ “John Dewey” in *Encyclopedia of Ethics* (《伦理学百科全书》), Lawrence C. & Charlotte Becker, eds., New York, 2001, Vol. 1, pp. 402-404. Jennifer Welchman, *Dewey's Ethical Thought* (《杜威的伦理思想》), New York, Ithaca, 1995。

④ “G. E. Moore” in *Encyclopedia of Ethics* (《伦理学百科全书》), Lawrence C. & Charlotte Becker, eds., New York, 2001, vol. 2, pp. 1109-1111. Brian Hutchinson, *G. E. Moore's Ethical Theory: Resistance and Conciliation* (《抗拒与和解:摩尔的伦理学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oore 一名有七种中译:1. 张荫麟译作穆亚,见本书所收《道德哲学之根本问题》;2. 贺麟译作摩尔,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3. 谢幼伟译作摩耳;4. 周辅成译作穆尔,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下卷,第650—673页;5. 黄建中译作穆诃,见黄建中:《比较伦理学》,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第369页;6. 郭昆如译作莫尔,见郭昆如:《伦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1年,第87—89页;7. 蔡坤鸿译作谟尔,见蔡坤鸿译,谟尔著《伦理学原理》,台北:联经,1978年。本集取用摩尔译名。Utilitarianism,一般译作功利主义,林火旺译作效益主义,见林火旺:《伦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第73—75页。劳悦强在本书中译作贵利论,见本书“下编:专论”之“译者附记”。

他们思想的异同。文体像一篇专业的报告,全文分为五章,每章的结构公式化,首列前提,然后概述杜威或摩尔在这方面的理论,接着是分析和评议,最后是小结。

第一章以功利主义为引子,简述两大哲学家对功利主义的评论,从而引出他们在观点上的三大分歧,包括内存价值、道德义务和自由意志等问题。第二、三、四章分别研究这三组问题。

第二章分为两节,第一部讨论“善”的定义,提出摩尔的中心理论——善的不可定义性,然后讨论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家培里(Perry)在《价值通论》(*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中对摩尔理论的评议^①,最后讨论杜威对“善”的阐释。第二节讨论摩尔对“善”之本质的见解。

第三章的前提是道德义务的问题,分两部,首先介绍规范性科学(normative sciences)的方法论和“应当”(ought)一词的运用。然后讨论杜威和摩尔对道德情境(moral situation)的见解。

第四章研究自由意志的问题,以自由意志和伦理关系的讨论作开始,然后分析杜威和摩尔对这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

最后一章总结二人在伦理学思想上之异同。

整篇论文约2万字,作为一篇硕士论文,长度适中。^②全文引用十三部专著和一篇学报文章。除了杜威和摩尔的经典论著外,张荫麟还参考了剑桥大师罗素的哲学文集,美国哲学家培里和罗杰斯(Rogers)的著作,以及老师史阿特已出版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书名《作为逻辑程序的价值判断》(*Valuation as a Logical Process*),全属当代伦理学著作之选。^③

一年前张荫麟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一文中,觉得作者直引原料太多,为该书其中一缺点。^④所以他在论文很少直引原文,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解说。他的英文造诣深,用词典雅,大概受老师吴宓的影响,字句冗长,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章风格。^⑤在论文中,他对两名家的伦理观分析透彻。但在理论上,

① “R. B. Perry” in *Encyclopedia of Ethics* (《伦理学百科全书》), Lawrence C. & Charlotte Becker, eds., New York, 2001, Vol. 3, pp. 1292-1293. R. B. Perry,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价值通论》), New York, 1926. 参考李江凌:《价值与兴趣:培里价值本质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 一般硕士论文大概都是2万字左右。萧公权在密苏里大学的哲学硕士论文也是2万字。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53页。

③ 见本书“下编:专论”之“附:张荫麟论文征引书目”。

④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见《全集》,中卷,第1193—1194页。

⑤ 可参考本书“下编:专论”之“译者附记”。

他的论文没有突破之处,大概杜威和摩尔的思想系统泾渭分明,可以比较的地方不多。整篇论文的优点在其对资料的掌握和清晰的论点。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只可惜校对草率,错漏多处。^①

张荫麟只花了一个暑期和一个学期便轻松地完成论文。就在1932年1月,他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面修逻辑代数(Algebra of Logic)和人类学,一面给文稿作最后的修订,课余还抽空翻译《浮士德》剧本上部。他在伯克利结识了谢文通,留美三年,到这时他才遇到一位读文史的朋友,二人畅谈文艺和翻译的技巧,讨论杜威和摩尔的思想,谢文通也知道张荫麟比较崇拜摩尔。多年后,谢文通误记,还以为张荫麟当年写的是博士论文。^②

张荫麟的好友浦江清也以为他在斯坦福不久便拿到博士学位,浦在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忧国伤时,既感外寇猖獗,时局动荡,也关怀挚友的前途,他去信张荫麟,劝他放弃哲学,改习其他实际的学科。^③张早有此意,他在伯克利修读代数逻辑和人类学,无非为转系做准备。他在同年3月把论文送到斯坦福哲学系,通过审查,取得硕士学位。正规的哲学训练于此告一段落。暑期他回斯坦福选修法文,并旁听一科经济学,轻易转到经济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④他在过去三年已修了不少社会学和心理学科目,再读一些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快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课程,通过面试,经济系博士委员会接纳张荫麟的博士论文提议,于1933年11月授予博士候选人资格,预计一年内完成论文。^⑤

虽然转了系,他对哲学的兴趣未减,据贺麟说,他打算在完成哲学硕士学位后,写一本哲学概论,总结他在斯坦福的收获。^⑥限于时间,有系统的概论没有

① 例如 Table of Contents (纲目) 中的 Realism (实在主义) 误植 Realm (领域)。文中 Property (特质) 误植 Properly (适当地) 等等。R. B. Perry 误作 R. P. Perry, 硕士论文, 第13页。

② 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广州文史资料》,第38期,第55页。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89页。

③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第72页,1932年2月10日星期三。

④ 张荫麟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不是社会系的纯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当时有两种社会学课程。一种是社会经济,直属经济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除各社会学科外,本科生必须修经济学、统计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另一种是纯社会学,直属社会科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本科生不用修经济、心理、伦理、统计等学科,但要专攻一种社会研究,例如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优生学、人口学等。见 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Register(《斯坦福大学年报》),1929—1930年,第416—418页。

⑤ 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The evolution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见斯坦福大学张荫麟成绩档案。参考《全集》,上卷,第12页。

⑥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3页。

写出来,他的哲学观点散见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0月所发表的八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的总结算》是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对目的、进化、循环、唯物等史观的批判,也是初步讨论以哲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尝试。在《道德哲学之根本问题》一文,他以张东荪的《道德哲学》为例,讨论伦理学中“应当”(ought)和“好”(good)的观念,文章提到穆亚(即摩尔)对这两个观念的解释,浅谈即止,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这时,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冯友兰在该刊第一、二期发表《新对话》,假借经学大师朱熹和戴震的交谈,展开一场理学的讨论,张荫麟以《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反对冯友兰“未有飞机以前已有飞机之理”的理学。^①接着他发表多篇《戴东原语录选录》,灵感部分来自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语录,部分来自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刚巧这时他把泰勒(Bayard Taylor)的英译《浮士德》翻成中文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②在《选录》里,他与戴东原大仙聊天,天南地北,从学术到时事,无所不谈,妙趣横生,于幽默中见哲理。有时他也在谈哲学的短文杂以时评,自成一格,《玩易》便是一例。此外,他还译了一篇罗素的短论,题名《罗素最近的心论》。

1933年的春天,张其昀来信,讨论国情,问及张荫麟在美的学业和未来大计。关于学业,张荫麟回信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③在张荫麟的学术生命中,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从此定位,此后研究张荫麟学术的学人都引用信中这句话。张云台说他选读哲学,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④他在信中提及将来邀约同志共编通史的计划。这时他已萌去意,他告诉张其昀,准备于年底回国。他和女朋友伦慧珠已言归于好^⑤,在1933年冬天他匆匆返国,博士论文没有写成,便结束四年的留美生活。

张荫麟准备以历史为专业,回国前他从斯坦福致函老师吴宓,说明归国后希望教历史。吴宓请陈寅恪帮忙,陈去信傅斯年,极力推荐张荫麟,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⑥,至今仍为史家津津乐道。

①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3—44页。

② 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广州文史资料》,第38期,第55页。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87页。

③ 张荫麟:《致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自斯坦福大学。见《全集》,上卷,第673—674页。

④ 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第4页。

⑤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1、45页。

⑥ 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6—47页,致傅孟真,1933年11月2日。

三 归国执教——出入史哲

从1934年到1942年,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进入第三阶段,他史哲双栖,活跃于北平的史学和哲学圈子里,以哲治史,撰写中国通史,但对哲学的兴趣未减。卢沟桥事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辗转西南,一面讲学,一面著作,研究宋史,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国难当前,实行以学术救国。

在北平,张荫麟执教清华母校,由哲学系和历史系合聘专任讲师,在哲学系为三、四年学生授伦理学和英美近代哲学名著选读两科,在历史系为本科及研究生主讲中国学术史,后又开宋史。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其时老朋友贺麟早于1931年从柏林回国,在北大讲授西方哲学史,并在清华兼授哲学概论和斯宾诺莎(Spinoza)的哲学。他们一起拜访清华哲学助教张岱年,结交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①

他和贺麟在1935年4月参加由冯友兰、汤用彤和金岳霖创办的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分别在会上宣读论文,贺麟用西方哲学观点分析《宋儒思想方法》,张荫麟刚好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了一篇逻辑学的文章,名为《可能性是什么——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在年会中,他简略地讨论“可能性”的问题。次年4月,在第二届年会中,他宣读一篇短文,名为《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实他在1934至1936年这两年所发表的哲学论文,都是以前研究的成果,对他来说,这时的志业是国史,他在1935年应邀编撰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清华请了假,专心以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编写一本大众化的通史。

通史的编撰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七七”事变后,张荫麟仓促南下,在天目山浙江大学短期讲学,不久他从香港坐船到越南,然后转往云南蒙自,到西南联大销假,仍在历史系和哲学系任教,后随校迁往昆明。课余他研究宋史,写了一篇短文,名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在《新动向》杂志发表。他认为周濂溪的所谓太极,实为粗糙的物理学,而朱熹则以为太极是理,是形而上学。他随手寄了一份文稿给贺麟,贺麟读后,马上写了一文反驳,他以为周朱的太极说,不是理与气的分别,而是一脉相承的演变。辩文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在当天的日记加了

① 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页。张岱年:《序》,见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第2页。

一条：“论周朱之太极说及其异同，驳斥荫麟浅薄之唯物论，关乎学术前途很大，须存稿也。”^①虽然二人的哲学思想不合，对他们的友谊没有影响，贺麟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939年春天，张荫麟应邀到重庆政治部工作，初时希望有机会为政府效劳，后来发觉只是闲职，没有作为，便趁这段空闲的日子读了一些陆象山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写了《陆学发微》。过了几个月，他返回昆明。因家庭波折及清华待遇的问题，他在1940年7月离开西南联大，转往遵义浙大任教。^②

战时百物腾贵，生活艰苦，但张荫麟在遵义的精神生活和学术生活是充实的。他工作认真，很受校长竺可桢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③，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更多方给他帮助和鼓励。他在浙大和谢幼伟重逢，这时谢幼伟在浙大讲授哲学，他们差不多每星期见面，从哲学到社会，无所不谈，趣味相投，引为知己。^④

他在浙大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三门课程。和学生相处得很好，没有架子，有时还约三五个学生到家里吃饭，畅谈天下事，无拘无束，人也比以前开朗。在遵义他和以前西南联大的学生保持联络，书信往来，指导他们研究历史和哲学。^⑤

张荫麟到了遵义不久，张其昀便邀他共商大计，准备建立“思想与时代社”，办一本月刊及出版国史长编丛书，来宣扬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一年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的计划终于实现。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石印本于1941年5月由浙大出版。三个月后，《思想与时代》月刊问世，以张荫麟写的“征稿条例”代替发刊辞。^⑥

当时抗战进入第四年，民生困苦，政治腐败，一般知识分子陷入清谈的闷局，张荫麟常在他的文章，针对时弊，向社会或当局进言。例如他在《思想与时代》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刚在法国沦陷区去世的直觉主义大师柏格森（Bergson，张译为“博格森”）的哲学思想，在文中他对近十余年来我国哲学界所流行的“形式主义”，颇有非议，觉得当前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把握经验世界之真实血

① 张荫麟的《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和贺麟的《与张荫麟先生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二文，见《全集》，下卷，第1663—1669页。《贺麟日记》，1938年6月14日、15日，见《天才的史学家》，第298—299页。

②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47页。

③ 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广州文史资料》，第38期，第59页。见《天才的史学家》，第90页。

④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见《天才的史学家》，第67页。

⑤ 张荫麟：《致李埏》，1940年至1941年7月，自遵义浙江大学。见《全集》，上卷，第682—686页。

⑥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9—20页。

肉之哲学”，而柏格森的著作，有其真知灼见，可供参考。^①

接着他发表《哲学与政治》一文，提出三个哲学修养的标准：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求全的精神，价值意识的锻炼。给当政者一个忠告，哲学如此，政治也应如此。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他从比较角度，试解释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他本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文章救国，事事关心。

张荫麟的生活本来就没有规律，在遵义他更忙个不停，授课、写作、约稿、编辑，有时通宵达旦工作，终于得了肾病。病中仍然不肯休息，有时还向谢幼伟借哲学书看，他对谢说：“看哲学书等如看小说。”^②他节译泰戈尔在1930年和爱因斯坦的对话，后来又译了一篇关于怀特海（Whitehead）思想的文章，都刊登在《思想与时代》杂志。这时朋友们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忧，傅斯年来信慰问^③，贺麟和李埏先后到遵义探望他。张其昀特别安排学生照料他的起居生活。张荫麟病情恶化后，张其昀匆忙乘车到重庆雇请专科医生到遵义，不幸中途覆车，在回程时，他接到消息，张荫麟已于10月24日谢世。^④学界同仁纷纷惋惜英才的早逝，彗星陨落。

四 张荫麟哲学思维之特点

从清华学校到遵义浙大，张荫麟在他二十年的学术生涯里，离不开史哲的研究。他的志业在国史，著名的作品也在国史，相比之下，他发表的哲学论文不多，没有专著。但他在美国斯坦福学习西方哲学三年，获得硕士学位，哲学基础扎实，回国后他一直在一流大学讲授哲学，在国内哲学界相当活跃。总的来说，他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谢幼伟说得对，在哲学方面，张荫麟不是哲学专家，他的哲学研究有倾向，但没有系统，并不隶属任何学派。^⑤五四之后，国人最熟识的

① 张荫麟：《博格森（1859—1941）》，《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1年8月。又见《全集》，下卷，第1825—1831页。

②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见《天才的史学家》，第69页。

③ 张荫麟：《致傅斯年》，1941年9月27日，自遵义浙江大学。又见《全集》，上卷，第680页。

④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又见《天才的史学家》，第9—10页。

⑤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之哲学》，见《天才的史学家》，第146—147页。谢幼伟：《张荫麟》，见《天才的史学家》，第163页。